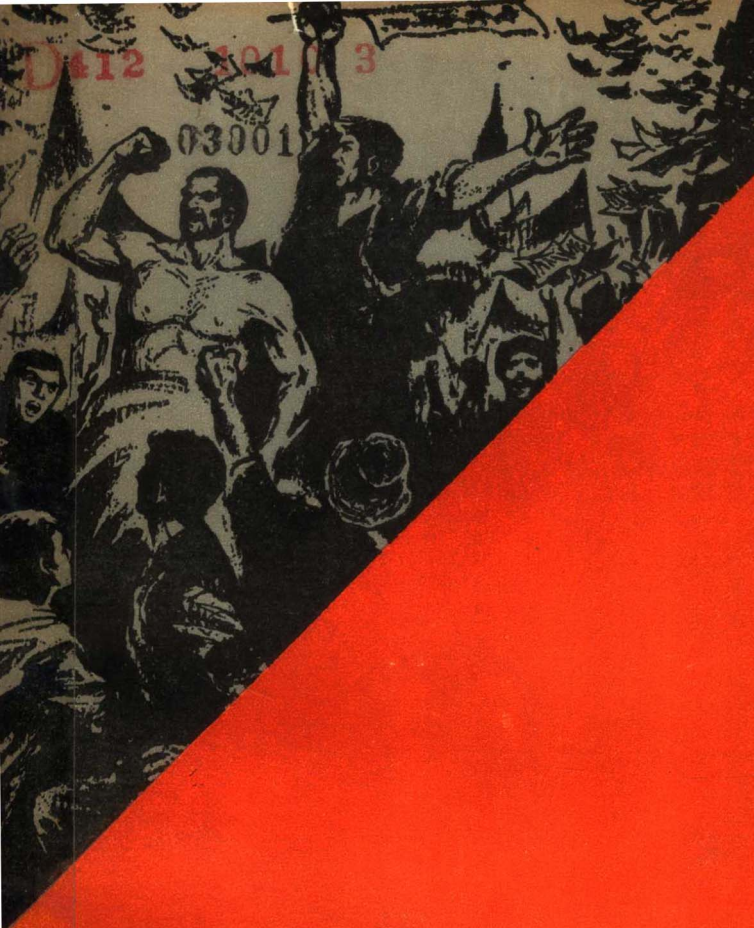




第二集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工人出版社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第二集)

工人出版社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第二集)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2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4,000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4,300册

书号: 3007·423 定价: 0.77元

目 录

邓中夏	史 兵 (1)
李启汉	司秉文 (149)
杨 殷	何锦洲 (189)
刘尔嵩	何锦洲 (217)
康景星	吴太伯 (243)

邓 中 夏

史 兵

第一章 学生时代

从古书堆中跳出来

雪白的衬衣，红色的领结，笔挺的西装，光亮的皮鞋。这个衣着时髦、英姿勃勃的青年，姓邓名康，字仲澥。后来，因为从事工人运动，让工人容易认，容易写，改名中夏，是北京大学学生。

邓中夏是古文爱好者，幼年，就进塾馆读“人之初”；童年，在小学、中学读“子曰”、“诗云”。一九一五年，进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在文史专修科攻读古文。一九一七年，考进北京大学国文学门（即中文系），学的是商周的诗词、秦汉的歌赋。邓中夏到北京大学后，很快就钻进古书堆里。就在一九一七这年，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是清朝翰林，曾两次留学欧洲。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

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蔡元培聘请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也聘请最顽固的遗老、拖着大辫子上课的辜鸿铭讲欧洲文学史，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刘师培当文科教授。这样，北京大学既是新思想、新文化的苗圃，又是旧思想、旧文化的荒园。在邓中夏的大学生活中，充满着新、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

一九一八年，杨昌济应聘来北京大学当教授。

杨昌济在日本、英国留学九年，回国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当老师。毛泽东是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邓中夏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和邓中夏，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

不久，毛泽东陪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向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从此，每逢星期日或假日，毛泽东和邓中夏就到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探讨学问。杨昌济把英文杂志《Out Look》拿出来，和毛泽东、邓中夏共同研究它刊载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问题的文章。在杨昌济家里，毛泽东和邓中夏开始在书刊上接触到布尔什维克。

北京大学的学生，有的是来“求官”的，有的是来求学的。“求官”的学生，不求学问，只求毕业文凭，作为进身官场的阶梯。这些学生，把时间当作粪土。邓中夏是真心实意来求学，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贵重。本来，单是学《四书》、《五经》，邓中夏就感到时间不够用。现在，他还要读杨昌济推荐的《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更感到时间不够用。利用晚上的时间读点书吧，宿舍里人多，爱好不同，

兴趣各异，我行我素，常常出现使人哭笑不得的场面：

在宿舍的这一角，暗淡的灯光下，有人把鼻子尖贴在《文选》上，聚精会神地看李善的小字注，有人在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在宿舍的另一角，有人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背诵桐城派古文，有人在辩论易卜生名剧《傀儡家庭》中的主角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在宿舍的又一角，有人唱京戏，有人拉二胡，整个宿舍乱糟糟，闹哄哄，活像庙会。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中夏没法读书。他约了一些爱读书，肯坐下来研究学问的同学，另找了个公寓。这个新公寓，就北京东皇城根达教胡同四号。邓中夏给新公寓起了个名字，叫“曦园”。

在“曦园”住的学生，因受新村主义^①影响，逐渐形成了实行新生活的团体。他们的学习宗旨是：互助，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参加的有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十六人。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里，大学生自己动手挑水、洗衣、做饭，出门不坐车，成了一种革命行动。这种新生活，可以逐步改变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

“曦园”的新生活，得到李大钊的支持，也引起一些自命为绅士的人的非议。他们说：“知识分子，不应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李大钊反驳这种论调：“这话很是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那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

① 新村主义是十九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生产和分配社会化的理论。他曾建立“新协和村”进行实验，企图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推行共产主义，结果，失败了。

得多。”①

一些爱串门的同学闻风而来，天南海北地闲聊，干扰别人学习。邓中夏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五分钟谈话”五个大字摆在桌上，爱闲聊的同学，看见这个牌子，很快就退出去了。“曦园”的同学们看到“五分钟谈话”的牌子这么灵，也都做了一个放在自己的桌上。从此，“五分钟谈话”，成了来“曦园”串门的同学必须遵守的规矩。

同学们对邓中夏床头的一对条幅特别有兴趣：

情操励冰雪

赤手搏长龙

这对条幅，上条出自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下条出自唐朝孙樵的《与王霖秀才书》。邓中夏把它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要有像冰雪那样洁白无瑕的高尚情操，要有敢于降龙伏虎的英雄气概。

“曦园”经常举办读书报告会。谁读了新书，有新的体会，就请谁作报告。有同学出门远行归来，就请他报告此行的感想和见闻。这些活动，大都是由邓中夏主持。张国焘说：“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地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两种风格。”②

邓中夏要求改革社会的思想，和他读的那些脱离现实斗争的古书，相差十万八千里，使他常常处在矛盾之中。

有一天，一位同学从湖南来北京探望邓中夏。他知道，

① 孤松：《低级劳动者》。《李大钊选集》第三〇五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六六页

邓中夏是爱读古书的，便花了三块钱，在长沙买了一部《庄子》——道家的经典之一，作为礼物带来。他满以为邓中夏见到它定会爱不释手。那料到，邓中夏接过《庄子》，看也不看，随手就把它撕了。

这是怎么回事？同学很不理解。后经邓中夏解释，才知道，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邓中夏已经决心从古书堆中跳出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改革中国社会的问题了。

参加第一次请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沉睡的中国巨龙。

中国人民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者却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一八年五月，日本政府 and 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北洋政府派军队去外贝尔加，参加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

最早知道这个卖国协定的，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这批学生，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卖国协定，全体罢学回国。他们回到祖国后，派李达、龚德柏、王希天、阮湘四个代表，和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商量决定，邀请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开会，研究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五月二十日晚上，邓中夏、许德珩等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和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去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卖国协定。

二十一日上午，北京学生第一次请愿开始了。

邓中夏、许德珩等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和留日学生两千

多人，来到新华门。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学生代表时，夸奖学生热爱祖国，勉励学生认真读书，为国效劳。学生代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很快就被冯国璋打发走了。

这次请愿，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尽管这样，这次行动说明，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北京学生初试锋芒，经受了锻炼，取得了经验。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次反帝爱国行动，称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吃一堑，长一智。邓中夏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力量。

邓中夏、许德珩等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一些高等学校学生，组织了学生爱国会。随后，联络上海、南京等地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邓中夏是学生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任总务部干事。

学生救国会的反帝爱国活动，很快就引起北洋政府的注意。北洋政府命令北京大学当局严密监视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学生救国会在不能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继续开展反帝爱国活动。

国民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这个宗旨，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纲领。

国民社有一百九十多名成员，从政治思想看，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等。这是国民社的骨干。

另一种，是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如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国家主义者曾琦，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吴载盛，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组织 A B 团首领的段锡朋。

再一种，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不愿意过问政治的人。

国民社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日成立，是中国最早的学生社团之一。《国民》杂志本来打算在国民社成立之前出版。经费是由社员每人出一点钱凑起来的，共凑得一千多元。总务股主任鲁学淇挪用公款，亏空了五六百元，以致《国民》杂志无法出版。

在困难面前，邓中夏挺身而出，接受了会计出纳工作，任劳任怨，筹集出版经费，使《国民》杂志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

《国民》杂志名义上是陈钟凡、黄建中主编，但因为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当时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并不问事。真正的主编是邓中夏、许德珩和黄日葵等。

《国民》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画了一个青年，正在凝神沉思，对未来饱含着无限希望。这幅画表现出五四运动前夜爱国青年的精神状态，是青年画家徐悲鸿的作品。

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顾问，并为它撰稿。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刊登在《国民》杂志第二期上，这篇文章的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号角。

《国民》杂志的《国内外大事》专栏，是邓中夏负责编的。他经常撰写文章，用“大壑”笔名发表，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述评。邓中夏在《中日新交涉》、《国防军之成立》、《国防军与日本》、《内阁问题》等文章中，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以及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揭露得淋漓尽致，读后使人拍手称快。

《国民》杂志公开谈论政治，经常发表反帝爱国色彩鲜明的文章。它的政治倾向，比它的宗旨更为激进。在五四运动

前夕学生社团出版的刊物中，《国民》杂志是反帝爱国政治色彩最浓的。

创办平民教育讲演团

一九一九年三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

“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兹登其征集团员启事与简章于后……”^①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新文化运动的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时有团员三十九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邓中夏长期担任讲演团总务干事，编辑干事，是讲演团的主要领导人。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讲演团最初的活动，只限于城区，在街头作不定期讲演。团员三、五人一组，打着白布小旗，到人多的地方，打起铜锣，吸引听众。讲演人站在高处，就地发表讲演。讲演的内容，主要是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制度，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习文化。

四月三日至五日，讲演团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连讲三日。邓中夏连着两天参加讲演，题目是《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这次讲演，很受群众欢迎。讲演时，刮大风，“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北京大学日刊》。

平民教育讲演团，从街头的不定期讲演，发展到利用官立讲演所，定期定点讲演。

有一次，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杨钟健四人，在北京南城模范讲演所讲演。邓中夏第一个讲，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邓中夏刚登上讲台，许多警察拥进讲演所，说讲演团事前没有通知警察厅，不准讲演。邓中夏他们对警察说，我们在各城区讲演，从来不要办这项手续，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邓中夏不理睬警察，随即发表讲演。接着，张国焘讲，题目是《知识的用处》。张国焘说：“今天我们来这里讲演……”，第一句话还没有讲完，许多警察一拥而上，整个讲台站得满满的，不准张国焘讲。一个警官大声吆喝：“解散！”邓中夏他们见警官蛮不讲理，便高声对听众说：“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无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列位想想，要过细想想。”台下听众掌声如雷。

一九二〇年三月，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三次常务会议。会上，邓中夏提出，讲演团的活动，要从城区发展到工厂、农村，讲演对象，从城市平民发展到工人、农民。会议采纳了邓中夏的意见。

四月三日，由汤炳荣、刘炽昌、王星汉、郭衍盈、李荟棠五人组成丰台讲演组，来到丰台七里庄、大井村讲演。

七里庄有一所小学。李荟棠他们进学校仔细一看，教室就是教书先生的厨房，书桌就是菜板。学生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经再三请求，先生才发话，让学生出来听讲。当刘炽昌讲《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时，这位教书先生闭着眼睛，吸着旱烟，颇有些不以为然。

大井村也有一所小学。学校门口贴着一张黄纸，上写

“新旧兼教，加讲经传策论”。这里的教书先生有三长：辮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他让学生排队立正听讲。这次由王星汉讲《缠足的害处》。李荟棠看到，有一个年轻媳妇正要出门听讲，被一个老太婆骂回去了。

这些大学生，大都是第一次来到农村。他们亲眼看到农村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感慨万分。李荟棠深有感触地说：“我是第一回考察乡间的情形，真没有料到象丰台这样一个大镇，离北京城才几十里路，教育一途竟糟糕到这等地步，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看来，中国还能算一个有教育的国家吗？”

四月八日，由邓中夏、罗运璜、刘正经、张广鸿、杨钟健、马元材、杨真江七人组成的长辛店讲演组，来到长辛店讲演。长辛店有一个几千人的铁路工厂。这个厂的工人史文彬等，热情接待了他们，邓中夏打开留声机，吸引听众。可是，来听讲的只有几个小孩和老大娘。

这一次出师不利，并没有使邓中夏泄气。他对听众少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今日是星期天，长辛店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晋堂去做礼拜，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

通过这几次讲演，许多团员了解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真实情况，认识到：“黑暗的中国，何处不应该改良？”

通过这次讲演，也暴露了一些学生的弱点：轻视工农群众，缺乏工农感情。有的人，本来就抱着“救世主”的态度来的。有个学生讲演时问听讲的人“生活丰富不丰富”？人家听不懂，不理他，走了。这个“救世主”看到人家不愿意听他讲，就责怪人家“愚蠢”、“无知”，表示再也不来了。

邓中夏和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坚持来长辛店讲演，并请史

文彬帮助在长辛店找了一间房子，作为讲演组来长辛店讲演的落脚点。他们一面向工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一面虚心向工人学习，和工人交朋友。

邓中夏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五四运动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以“战胜国”资格，派代表团去巴黎参加和会。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列强在我国的特权，收回我国山东权益等七项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巴黎和会，是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他们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拒绝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传到北京大学，好似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人们被激怒了。五月三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并请各校派代表参加。大会由北京大学学生易克嶷主持。他沉痛地向大家报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后，说：“同学们，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再沉默、等待，国家、民族就只有灭亡，我们就只有做亡国奴了。”

会场响起了呜咽声。

邓中夏站起来，激动地说：“大家不要哭了。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

大会决定：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反帝爱国

示威游行，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出卖国家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天刚破晓，邓中夏和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队伍刚走出校门，北洋政府教育部一个次长匆匆赶来，阻止北京大学学生去天安门集会。他还威胁说：“学生不准上街胡闹。”

一位学生当即反问他：“去天安门开会，上街示威游行，怎么说是‘胡闹’！国家都快要灭亡，我们快要做亡国奴了，难道还不让我们救国吗？”

这位次长说：“学生就是要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

邓中夏大声说：“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

学生们的质问和挖苦，使这位次长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邓中夏接着说：“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北京大学学生队伍冲破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拦阻，向天安门进发。

下午，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会后示威游行。

那位教育部次长又赶到天安门前，阻止学生游行。他大声吆喝：“我是奉教育部命令来的，请大家迅速解散。有事可以派出代表，商量着办。”

邓中夏大声喊道：“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学生队伍冲破重重阻挠，出发游行。北洋政府派出军警，逮捕学生，镇压反帝爱国运动。

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月四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大会，决定：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同学，进一步组织起来，继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会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这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会，也是中国第一个学生会。邓中夏在干事会文书股工作，编《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邓中夏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主任。

五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和各地学生联系，采取共同行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邓中夏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去湖南找毛泽东，研究在湖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问题。

当时，统治湖南的封建军阀张敬尧封锁新闻，不准湖南的报纸刊登五四运动的消息。湖南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很不了解。邓中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全面情况，提出在湖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非常赞成。他把邓中夏安置在楚怡小学休息后，连夜去找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在后山操场开了个月光会，决定请各校学生派出代表，于二十五日去楚怡小学开会。

开会这一天，楚怡小学特别热闹。各校派来的二十多个代表，都是各校学生的头面人物。他们是：长沙商业专科学校的易礼容、彭璜，湖南政法专科学校的夏正猷、黎宗烈，湖南工业专科学校的柳敏，明德中学的唐耀章，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振翩等。毛泽东介绍邓中夏和各校学生代表见面后，由邓中夏报告北京学生五四那天游行示威的详细情况，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经过。当邓中夏讲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时候，各校代表拍手称